

从情感史的视角看流行病

马百亮

“一定要和这封信保持距离！看完了就一定要消毒。我们营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大约30名军官都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周五，医院里人满为患，体育馆的临时医院也爆满，现在到处都是裹着毯子缩成一团的人……年轻的士兵们像苍蝇一样纷纷病倒。”

1918年6月24日，在斯卡伯勒附近狂风肆虐的战场上，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爬进帐篷，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便是信的开头。乍看之下，欧文似乎非常谨慎，甚至有些惊慌，但是读到后面，会明白这是对当时英国人对待“西班牙流感”的典型态度的嘲讽和揶揄，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显然是在逗母亲开心。他接着说：“这种事情太司空见惯了，我是不会这样大惊小怪的。我已经决定不这么做了。”可见，他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消毒措施，反而认为流感是个笑话。

这是《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中众多与流感疫情有关的趣闻轶事之一。本书作者是英国著名调查记者和医学史家马克·霍尼斯鲍姆。他本是伦敦大学城市学院的高级讲师，在《观察家报》《柳叶刀》和《医学史》等大众和专业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撰有多部医学史著作。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也让他变得“炙手可热”，或讲座，或访谈，或撰文，或书评，获得邀约不断。截止到目前，他的作品《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和《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都已被译成中文。

《人类大瘟疫》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遭受的几场全球性流行病，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西班牙流感、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也包括不那么众所周知的如20世纪20年代的洛杉矶鼠疫和30年代的鸚鵡热。在这部书中，霍尼斯鲍姆详细介绍了这些流行病暴发的经过，揭示了包括城市化和全球化在内的人类行为是怎样影响流行病的传播方式，赞扬了作为病毒猎手的流行病学家克服地方、国家乃至全球的机构性障碍，以非凡的勇气和决心追查疾病的源头，并提醒人们“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在，而在于何时出现”。这本书第一版问世于2019年4月，就在半年后，新冠疫情爆发，可谓一语成谶，而我们至今依然生活在这场疫情之中。霍尼斯鲍姆在书中一再警告说，瘟疫的到来不可预测，总是会让人类措手不及，而在2020年3月底，他本人也出现了发烧和咳嗽的症状，因为当时没有接受核酸检测，无法完全证实，但他患上的很可能就是新冠肺炎。

这本书第一版的副标题是“100年的恐慌、歇斯底里和傲慢”，中文版也是据此本翻译过来的。2020年6月，本书又出了第二版，增加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章节，因此探讨的大瘟疫由原来的9个增加到了10个，副标题也相应改成了“从西班牙流感到新冠肺炎的全球传染史”。中文版2020年5月问世，由于时间差，很遗憾地没能把这一章包括进来。

中文版刚刚问世的另一部作品《流感大历史》虽然中文副标题是“一部瘟疫启示录”，但原作的副标题其实是“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这本书探讨的仅仅是流感，霍尼斯鲍姆在其中追溯了现代流感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从重感冒的同义词逐渐变成值得大众关注的科学谜题，并成为更广泛的“世纪末”焦虑和生物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因此，就像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三大支柱是传染病的医学史、最近的情感史学和物质文化社会学。霍尼斯鲍姆的这两本书尽管主题涵盖范围大小不同，副标题却都包括“恐慌”和“歇斯底里”，他的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从情感反应的角度讲述流行病的历史。从2009年出版的《与恩扎一起生活》，到2014年的《流感大历史》，再到2019年的《人类大瘟疫》，随着霍尼斯鲍姆对于瘟疫叙事的驾驭能力越来越炉火纯青，探讨的话题也越来越广泛，但一以贯之的是情感叙事写作风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作者对于史料的选择有关，其中包括报纸文章、文学作品、医生的私人记录，以及信件和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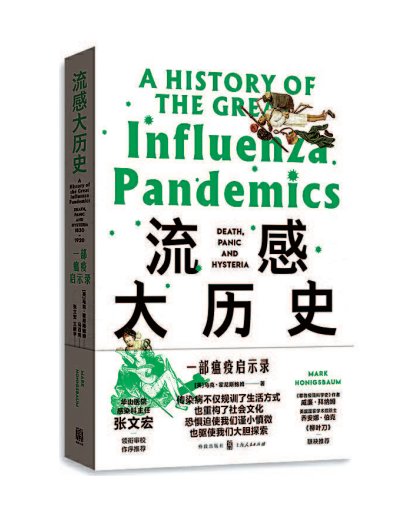
就像张文宏教授在为《流感大历史》中文版所作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始终是和传染病纠缠在一起的。一部传染病史，就是人类和各种微生物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之，人类和微生物互动的历史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人类占上风，人与微生物相安无事，相得益彰，另一种是致病微生物占上风，这时就会造成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瘟疫和饥荒一样，已经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创伤。因此，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历史学著作中，瘟疫叙

事一般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疫情本身的描述，二是人们对疫情的思想 and 心理应对，尤其是情感反应。如果说前者因为具体瘟疫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那么后者则因为人性跨越时空的普遍性而大同小异。毕竟，瘟疫给人类带来的是病痛和死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触动内心和情感呢？在这方面，无论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雅典瘟疫的描述，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家乔万尼·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对中世纪佛罗伦萨瘟疫的书写，还是存在主义文学家阿尔贝·加缪虚构的鼠疫期间奥兰小城的故事，概莫能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看到的是瘟疫之中的人们对神圣和世俗之事都漠不关心，变得肆无忌惮。对他们来说，生死难料，荣誉和财富都如过眼云烟，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沮丧之情笼罩着雅典，他们通过神谕寻求解释，叙事更重于领导人伯里克利。在《十日谈》中，人们把瘟疫归因于上天的恶作剧或是对人类邪恶的惩罚，变得恐惧和猜疑，他们远离瘟疫受害者，自行隔离，有节制地自得其乐，或是纵情享乐，挥霍无度。而在《鼠疫》中，加缪以更多的篇幅、更加文学化的手法描绘了瘟疫下的人生百态。

今天，情感史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从情感的角度考察瘟疫成为一个有趣且回报丰厚的尝试。如果说《人类大瘟疫》限于篇幅，对每一种瘟疫的介绍更就事论事，叙事更外在化和新闻化，《流感大历史》则更侧重对情感的描绘，叙事更为内在化和文学化。这也与流感症状的变化多端有关，这一特征赋予了流感很强的隐喻灵活性，例如，它被喻为希腊神话中变幻莫测的海神普洛透斯，或是被喻为罗马神话中司掌大门和开端的两面神雅努斯，因为和两面神一样，流感也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张面孔与死亡和痛苦有关，西班牙流感经常被和黑死病相提并论，而另一张面孔出现在两次流行病暴发之间，因为此时的流感更多被视为一种不便，而不是致命的威胁，被认为和普通感冒一样微不足道。关于流感和普通感冒之间的区别，张文宏教授也有一个妙喻，那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猫和老虎，虽然都是猫科动物，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流感大历史》文学化的一面还体现在它多处对《鼠疫》或明显或隐含的借用，例如，在谈到死亡人数之多让人无法想象，成为抽象的数字，反而无法激起人们的情感时，作者直接引用了《鼠疫》中的一段话：“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样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再如，他对于瘟疫的必然性和不可预测性的警告，让人们想起《鼠疫》的最后一段话：“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贯穿全书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流感除了本身具有的生物学性质之外，还吸收了社会、文化和史学的因素。例如，俄国流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残忍的“开膛手杰克”一样阴森可怖，让伦敦人毛骨悚然。它突然神秘地降临，散播恐慌、歇斯底里和死亡，然后又同样神秘地消失。后来，随着流感日益成为科学关注的对象，它又开始被视为更加广泛的社会病态的晴雨表，而这些病态与维多利亚时代对疲劳、堕落和现代生活的技术化过程的担忧有关。电报技术、运输技术和统计学的发展，媒体和整个社会对名人患者的关注，以及当局和广告商对人们恐惧心理的利用，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人们的歇斯底里和恐慌。



霍尼斯鲍姆借鉴了福柯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理论，对百年前疫情暴发期间的恐惧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和阐释。在和平时期，像石炭酸烟丸这样的专利药品和保卫尔这样的保健品是利用人们的焦虑和恐惧进行营销，但在战争时期，这类商业广告开始用民族主义的话语来赞美恬淡寡欲和坚韧不拔的美德，使用像“抵抗”和“攻击”这样的军事隐喻和医学概念。这是因为，在和平时期，恐惧不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而在一战期间，恐惧被认为会削弱前线和后方的士气。为了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对抗共同的敌人，英国政府在国内媒体的自愿合作下，有意识地培养对德国的仇恨情绪，而流感风险则被同样有意地忽视，也没有发起流行病学调查。然而，随着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增加，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之上，为避免流感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媒体、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恢复了以前强调流感风险的话语。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霍尼斯鲍姆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迟迟不愿把新冠疫情升级为“大流行”，除了卫生和政治考量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表达“pandemic”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恐慌”，因为其英文表达是“panic”，比“pandemic”仅少了三个字母而已。需要指出的是，其实这两个词的词源是不同的，后者和疾病一词的搭配出现于1853年，其词源构成和表示“传染病”的“epidemic”是一样的，“epi”和“pan”都表示“全体”，而另外一部分来自表示“人”的“demos”。而表示“恐慌”（尤其是指没有明显原因或由微不足道的原因及危险引起的夸张的恐惧）的“panic”一词才真正源于希腊神话中代表森林和田野的潘神，据说他会发出神秘的声音，而这种声音会在兽群或人群中引起具有传染性的、毫无根据的恐惧。

虽然可以说每一次疫情都是独一无二，每一次暴发都让人类出乎意料、措手不及，但我们还是可以以从以往的暴发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今天阅读霍尼斯鲍姆对于一个世纪以来多场大流行的描述，我们总是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当前的新冠疫情而言，我们也总是在将其与之前的各种大流行相比较，例如SARS，因为两者的病原体都是冠状病毒。就像国际知名流行病学专家罗伊·安德森在2004年指出的那样，那次成功战胜SARS病毒只是因为“侥幸”，因为其传染性很低，加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采取了十分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如家庭隔离和大规模隔离检疫。他还预测，如果SARS在北美或西欧暴发，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这里的人更喜欢诉诸法律。此外，他还指出，真正的全球威胁不是SARS病毒，而是一种具有全新抗原性变异的流感病毒。今天来读安德森的这篇文章，我们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对抗瘟疫的历史也是一部情感史。安德森提醒我们，对SARS的有效控制可能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自满情绪，认为我们曾经成功过，因此还能再次成功，这样的情绪可能会蒙蔽人们的双眼，教人忽视真相。无论是在其著作中，还是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霍尼斯鲍姆也总是在发出这样的警示：人类行为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还会导致新的、未知病原体的出现和变异，而全球航空旅行的发展意味着病毒可以更快地传播，使流行病在72小时内变成大流行。人类应该规避任何关于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幻觉和自以为是，因为一旦遇到新情况，曾经有效的方法往往会把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家、媒体和政府导向错误的道路。而在为《流感大历史》所作序言的结论部分，张文宏教授也告诫我们：“微生物在进化，人类也在进化，每次流行都有其特点。人类必须保持谦卑之心，依靠科学，既要跑得比微生物更快，也要学会和微生物共生共存。”

（作者为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马克·霍尼斯鲍姆 著
马百亮 译
张文宏 王新宇 校
《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
（格致出版社，2021）



▲中国牛分黄牛、水牛、牦牛、瘤牛。这件滇国贮贝器上的瘤牛，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瘤牛古代叫牦牛或犏牛，我国瘤牛灭绝已久。



▲鄂尔多斯式牦牛青铜带扣，鄂尔多斯博物馆藏。双牛身下有一串树叶状纹饰，表现牦牛下垂的长毛。



►商代祭祀，多用圣水牛，圣水牛是野水牛。这件商代牛尊，湖南衡阳市郊包家台子出土，衡阳博物馆藏，盖上有小虎。牛是老虎的捕食对象。

视界观

牛年说牛

李零



▲牦牛金带扣（上）及饰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带扣出土于新疆吐鲁番交河沟西一号墓地一号墓，饰件出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四棵树墓地，东西虽小，但栩栩如生。



▲据学者研究，黄牛是杂交牛。故宫博物院藏韩泥《五牛图》，五牛都是黄牛。这件错银战国卧牛镇，安徽寿县楚国花园出土，器底有楚国铭文：大府之器。从牛角看，可能是黄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文均出自李零《十二生肖中国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续谈“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

叶朗

尤三姐自刎：一死报痴情

尤二姐、尤三姐是宁国府贾珍之妻尤氏继母的两个未出嫁的小女，随她们母亲住进宁国府。尤三姐长得很美，绰约风流。此时贾琏娶尤二姐成了二房，贾珍又看上三姐。尤二姐担心日后要生出来，就和贾琏商议让尤三姐找个人嫁出去。她找尤三姐商量，尤三姐说：“只要我捧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三姐说，五年前她们老娘家拜寿，她看中了串客（票友）里一个作小生的，叫柳湘莲，要他才是才。后来贾琏去外地正好遇见柳湘莲，就推荐尤三姐，柳湘莲很高兴，并用传家之宝鸳鸯剑作为定礼。可等他进了京，听说尤三姐是宁国府贾珍的小姨，马上反悔了。他对宝玉说：“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了，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狗儿猫儿都不干净。”于是向贾琏讨回鸳鸯剑。尤三姐在房里听见柳湘莲反悔，就摘下剑来，将一股雌剑藏在肘内，出来时，说：“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赠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搥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湘莲想不到尤三姐这样标致，又这等刚烈，自悔不及。等三姐入殓后，湘莲抚棺大哭一场，便告辞出门，昏昏沉沉，忽见尤三姐从外而入，向柳湘莲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今以死报此痴情。”又说：“来自情天，去自情地”，“从此再不能相见矣。”

尤三姐以一死报痴情，和林黛玉眼泪哭尽，“焚稿断痴情”一样，都是“痴情”“情种”的极致形态，这也是“有情之天下”最灿烂的一种形态了。

怡红院中的狂欢节：人回到人自身

《红楼梦》里描写过多次寿宴，每一次都是按照上下尊卑严格的等级秩序。而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个寿宴完全不一样，是怡红院的丫鬟为宝玉过生日。书中描写，芳官、碧痕、小燕、四儿、袭人、晴雯、麝月、秋纹八个女孩子一起凑钱为宝玉庆生。她们等林之孝家的为首的一帮昼夜的人过去，便关了院门，摆上酒果，卸下正装，开

始喝酒。因有人提议，又把黛玉、宝钗、探春、李纨、宝琴、香菱等人请来，一起掷骰子抽籤喝酒表演。一直喝到二更，把黛玉、宝钗等人送走，余下的人又行令，用大钟喝酒，都喝醉了，横七竖八地睡下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都不好意思。

这场生日宴会，是大观园中“有情之天下”的典型场景。我们会注意到两点，第一，这个生日宴会自始至终充满了欢乐，书中的描写是大家都笑，狂欢式的笑。第二，这里所有出席者，没有尊卑、主奴、贫富之分，一律平等。主办者是怡红院的八个丫鬟，每个人都都要出一点钱办宴席。宝玉说不该叫芳官、碧痕出钱，她们哪有钱，受到晴雯的反驳，说不在钱，而在“各人的心”，要“领她们的情”。他们一起喝酒、猜拳、唱小曲、睡倒，这种情景地地道道就是西方文化中说的“狂欢节”。

歌德说，罗马狂欢节“是人民给自己创造的节日”，“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别刹那间仿佛不再存在了，大家彼此接近”，“严肃的罗马人民，在整整一年里他们都谨小慎微地警惕着最微不足道的过失，而现在把自己的严肃和理性一下于就抛到九霄云外”。尼采认为这种节庆狂欢的生活状态是酒神精神的表现。人充满幸福的狂喜，仿佛都着了魔，“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融洽，甚至融为一体了”。

俄国学者巴赫金说，“在日常的、即非狂欢节的生活里，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差异的屏障所分割开来”，同样，“人们参加官方节日活动，必须按照自己的称号、官阶、功勋穿戴齐全，按照相应的级别各就各位，节日使不平等神圣化”。我们看元妃省亲的各项活动就是如此。但是，“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狂欢节超越了世俗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以及各种特权、禁令，也就超越了日常生活种种局限和框架，显示了生活的本身面目，或者说回到了本真的生活世界。人与人不分彼此，互相平等，不拘形迹，自由来往，从而显示了人们自身存在的自由形式，显示了人的存在的本来形态。“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的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

怡红院这个晚上的宴会，不就是歌德、尼采、巴赫金说的狂欢节吗？

晴雯与宝玉诀别：一道彩虹照亮大观园的“有情之天下”

晴雯被王夫人赶出怡红院出于两条罪状，一是模样长得标致，二是言语尖利。王夫人喊晴雯出来时，正值她身上不舒服，刚起床没有梳妆，王夫人一见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这两天作这狂狂狂狂狂狂狂。”王夫人命人把晴雯、四儿、芳官这些“狐狸精”都赶出怡红院。晴雯本已病重，被赶出后，就如宝玉说的“如同一盆才抽出嫩箭来的兰花送到猪窝里去一般”，很快病危。宝玉偷偷跑去看她。晴雯见是宝玉，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说出半句话来：“我只当不得见你了。”再再咽说完，伸手指向被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绡袄脱下，对宝玉说：“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又说：“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晴雯这几段话，真是句句是泪，字字是血。晴雯临死和宝玉换袄，以便将来躺在棺材内怀念怡红院的生活，不仅表现她心中的“儿女之真情”，更表明在她心中有一种人格的尊严，她和宝玉是平等的。

当然，这是一个悲剧，是花狂风、柳愁骤雨的悲剧，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悲剧，是“黄土垄中，女儿命薄”的悲剧，总之是“有情之天下”被吞噬的悲剧。

有学者说，晴雯和宝玉的诀别，有如一道彩虹，照亮了大观园的女儿世界。我以为这话说得很好，也可以说，这场诀别，是照亮了大观园的“有情之天下”。

* * *

以上我们看到了大观园中又一个一个活生生的场景，看到了在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有情之天下”。它不是虚幻的确定，而是真实的存在，不是彼岸，而在此岸。

《红楼梦》开篇，曹雪芹就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中的“痴”和“味”在两点。一是追求儿女之真情，一种纯真的爱。二是追求人间之平等，超越等级观念、等级制度的平等自由的世界。这两点在曹雪芹心中作为人生终极意义之所在“有情之天下”里统一。在曹雪芹那个时代，这是一种非常新的思想。（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